

◀（上接 9 版）

行，和平安时代贵族女孩的出仕，本质大约十分相似吧。这样的洒落和见地，并没有因为阶层差异而出现偏差，也非孤立性性别语境中产生，而似乎穿越了时空。其中呈现的智慧，堪称潇洒，恐怕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宫本常一笔下的流浪者，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作者从来不把观察对象当做经济关系中一个结构性的存在，而是通过对其言行回忆的转述，把“人”的主体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比如土佐源氏，一位真正的流浪贫民，没有因为落魄而失去话语的权利，恰恰相反，相信读者对他的成长罗曼史印象颇为深刻，宫本常一将无数温柔笔墨赋予这位一生挚爱着女人和牛的乡村落伍者，让他说出了“我骗了不少人，但没有骗牛”、“其实每一个都是亲切温柔的女人”之类的名句。宫本承认在闭塞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可称颂的盲区，但受到环境制约的人们也对应生出自己的法则；并且，这个浑厚世界中的文化积淀是错层的，也是多元的。除了农村边缘人，他在文化传承者方面的记录更为用心。

作者自己说明，这本田野调查的主题之一，是书写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古老传承，即描述这些老年人年轻时是在何种环境中如何生存下来，“不是作为单纯的回顾，而是作为与现在密切相关的问题，思考老年人产生的作用”。《文化传承记录者》系列几乎采用了摄像般的密集采写。尤其是第二篇，把与高木诚一的交往细节一一交代，让高木的博学、技巧和视野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写出了一位“向村民展示着思想和生活的方向”的文化传承者形象。宫本用最尊敬的语言表达了对他们的评价：“民间的文化传承者不仅仅是单纯地将旧传统传承给后代，还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这其中闪耀着农民的朴素和充满活力的明朗……正是以他们为核心的一群人，引领着战前的日本农村走向进步。”

通过高木诚一的背景和支撑体系，可以看到宫本常一民俗研究的社会时代背景，这是十分重要的切口。高木的乡村体验和研究是十分全面的，涉及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宫本常一的工作其实也是如此。但宫本强大的视觉感官系统以及敏感的心性，使他的书写不再拘泥那一

种风格，而是趋向和讲述者立场融合的视角。若非有真正的共感和同情，是无法做到的。《我的祖父》一文通过对祖父宫本市五郎的人生追忆，实则揭示了宫本常一的成长背景和民俗启蒙，为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他的民俗书写立场提供了注释。作者并没有写祖父是如何教他说唱民间口头文学，只是平静地叙述了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时间里所听到看到的琐碎片段。其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和祖父一起试图救助一只乌龟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宫本常一乡土启蒙的缩影，也体现了他乡土观的核心。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山里田边的小水井里有一只小乌龟，我每次上山都要看一眼这小乌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想总困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很可怜，就让祖父把乌龟从井里捞上来，用绳子捆着拿回家去，打算在家里饲养。我高高兴兴地往家走，但路上忽然觉得乌龟很可怜，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定会感到很寂寞。我手提着乌龟大哭起来，一个路过的女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说“乌龟很可怜”，继续往山上的田地那边走去。那女人跟着我走。在田头，祖父安慰我，要我把乌龟放回水井里。他说：“乌龟有乌龟的世界，还是放在这儿好。”我现在还记得这句话。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这只乌龟还在那口井里，而且长得很大了。有一天，旁边田地的老大爷说：“乌龟长得这么大了，那里面的世界太小了。”然后把他捉上来，放到旁边的溪洞里。傍晚我沿着山路回来，有时看见乌龟慢吞吞地在路上爬。祖父只要在山路上看见这只乌龟，回来后肯定都会告诉我。

珍惜着自然中人和动物一切生命，让生命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也不固执地拒绝改变，而是随着自身的发展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世代之间的心灵交流是传承的途径。关于祖父的记忆，糅合了睡前的童谣、草子传说、生活禁忌、节日礼数，以及从“我”十岁开始每晚祖父都用苍劲的嗓音领唱的“口说”表演。这是祖父最擅长的表演，也是他一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民俗印记。这类口说文学，其表演的趣味性和仪式感要比说唱内容本身来的更重要，而且由于音调、说唱习惯的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表演都有自己的特点。正是因为有所不同，才是真正的人的传承。这段经历是宫本常一的起点，故乡也成为他后来研究的重镇。他从来都不是要努力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但他从



宫本常一摄影作品《志摩·国崎·茶屋念佛》



宫本常一摄影作品《见岛·宇津·渔网之上》

未把自己“置身于外”。作为民间传承者和记录者，宫本常一背负了和祖父不同的使命，却始终忠实于从祖辈那里习来的关于存在和自然的法则。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本里充满了身体的经验。这个身体所在之处，便是他的立场。

在宫本常一镜头下的田野和农人，很美。和他呵护乡村的文字一样，是一种温情的注视。在熟知乡村种种生态的前提下，在追求村落繁荣的愿景下，这种温情并不是和政治历史语境相隔离的感伤，其不仅来源于血液中流淌的故土情结，也包括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一种生活终将成为历史的预知，体现了对残留在这块背景中的人物的切身的体恤。真正改变的不是土地，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文化和民俗的传承，对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详尽记录，恰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们了解自我，认可自我，有可以回溯的文化故土和心灵栖息之处，由此获得可以继续前行的力量。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可以说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和民俗写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代日本的乡土情感结构。

尽管在当代的城市生活中，对故土的情感需求似乎已

经不那么迫切，那这种诗情是不是一种梦幻的片刻满足呢？具体的民俗形式，也许会在文献和博物馆中保留下来，而人们的主体情感，则活态地蕴藏在每个人的记忆之中。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写：“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而“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这是文化遗产的历史基础。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乡土不当作乡村实体，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来阐释；此时乡土不是故乡和某个具体的村落或者地区，而与民族国家同构。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将个体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相关联，捕获完整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以期创造更为丰富的当下和未来，也许可以从用心记录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开始，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

有望成为斯拉夫通用语的新语言

捷克语言学家 Vojtech Merunka 和克罗地亚人类学家 Emil Hersak 构想了一门新语言，希望能在斯拉夫人中间搭建桥梁。这样一个新兴语言计划证明，人造语言可不仅仅是过去那个千年的历史遗迹，它还活生生地存在着。两位学者都希望，这门泛斯拉夫语言能够将庞大的、超过三分之一欧洲人口的斯拉夫人群更紧密相连。

“新斯拉夫语是一种‘区域内人造语言’，旨在促进现代斯拉夫语的口语及书面语使用者们的相互沟通。”该计划的网站上如是说。

新语言也希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谷歌在线翻译的中介语言是英语，而这会导致更多的翻译错误。

Merunka 教授还提到促使他新造语言的一个主观因素：他注意到，不同斯拉夫语言的使用者聚在一起时，往往使用英语——尽管他们的母语之间高度相似，这让他备感困扰。

这一计划将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言大会上被正式提出。会议将于 6 月 1 日在捷克与斯洛伐克边界附近的捷克小镇举行。

而在上个月，一群来自巴尔干地区的语言学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民间人士推出“共同语言宣言”，主张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和蒙特内哥罗语实际上是一种多中心单一语言的各个版本。然而，这一宣言在所涉国家却并不十分受欢迎——巴尔干地区多个世纪以来都是火药桶，战乱频仍，而国族认同又通常与语言休戚相关。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例，是捷克共和国在重新独立时，曾试图主张“捷克语”，却发现 Czechia 一词在英语世界已经没人使用了。

“新斯拉夫语”的网站列出“白俄罗斯语、波斯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克罗地亚语、捷克语、卡舒比语、马其顿语、蒙特内哥罗语、波兰语、俄语、卢森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索布语、乌克兰语及其各种方言”，认为这些现代斯拉夫语的使用地区未来都有望以新斯拉夫语为通用语。

（编译/黎文）